

失 踪 者

(美)托马斯·豪泽 著

刘京胜 于凤玲 译



17/2.6
205
2

失 踪 者

(美) 托马斯·豪泽 著

刘京胜 于凤玲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MISSING

本书根据西班牙马丁内斯·罗卡出版社
1984年西班牙文版译出

失 踪 者

(美)托马斯·豪泽 著 刘京胜 于凤玲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75印张 186千字插页2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66 定价：1.90元

ISBN7—5014—0044—x/I·11

印数：00001—14000册

前　　言

查尔斯·埃德蒙·霍尔曼1942年5月15日出生在纽约。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继之在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后“光荣”退伍。1972年，他和妻子乔伊斯暂居智利，从事独立记者职业。

1973年9月17日，智利军事政变推翻了以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自由选举当选的政府后第六天，查尔斯·霍尔曼被一些军人逮捕。一个月之后，经过指纹鉴定才查出他的尸体，尸体被送到圣地亚哥的太平间。霍尔曼是这次智利军事政变中死去的两个美国公民之一。

查尔斯·霍尔曼死后的九年中，这个事件仍然留在公众的记忆中，因为连续不断，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具体说，就是越来越可靠的证据表明查尔斯·霍尔曼是由于发现了美国参与此次智利军事政变的证据，而在美国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官员事先知道的情况下，被处决的。

此书对这些事实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记叙了一个真实的事件。1973年9月12日美国青年记者查尔斯·霍尔曼在智利发现了美国参与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的证据。5天之后，一群智利军人把查尔斯从家中抓走。从此他失踪了。智利当局和美国大使馆一口咬定不知他的去向，否认智利军政当局曾逮捕过他。查尔斯的父亲和妻子坚持不懈，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查明了事实真相。此事在美国及拉美各国引起了极大震动。后来此书被改编成电影，在拉美各国深受欢迎，被称为“每个拉美人都应该看的电影”。

目 录

第一部分

- 一、查尔斯 (1)
- 二、1970年，智利 (9)
- 三、1970年，华盛顿 (17)
- 四、阿连德的智利，第一年 (28)
- 五、1972年，查尔斯·霍尔曼在智利 (37)
- 六、1973年8月，纽约 (46)
- 七、1973年9月，圣地亚哥 (52)
- 八、政变 (59)
- 九、比尼娅·德尔马尔 (65)
- 十、圣地亚哥 (92)
- 十一、恐怖 (105)

第二部分

- 十二、1973年9月，埃德和伊丽莎白·霍尔曼 (114)
- 十三、乔伊斯·霍尔曼，圣地亚哥的11天 (123)
- 十四、等待 (147)
- 十五、1973年10月4—7日，埃德·霍尔曼的
艰难历程 (156)

- 十六、1973年10月8—12日，继续奋斗……………（171）
- 十七、1973年10月13—21日，寻觅结束……………（180）
- 十八、遗体……………（194）

第三部分

- 十九、埃德·霍尔曼的三个问题……………（199）
- 二十、查尔斯·霍尔曼是被智利军人杀害的吗……………（209）
- 二十一、美国政府隐瞒了吗……………（216）
- 二十二、最后问题……………（237）
- 作者后记……………（271）

第一部分

一、查尔斯

“五万五千美国人死在越南，和这个数字对照，谁也不会关心死在智利的两个美国人。”

伊丽莎白·霍尔曼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了一下，继续说道：

“可我关心，因为其中的一个是我的儿子。他是特殊的人。我想任何一位母亲都会这样夸她的儿子，”她微笑着说，“但对查尔斯，这话是受之无愧的。他是很特殊的人，请允许我给您讲点他的事。

“查尔斯出生时，一头卷发，殷红的两颊，绿眼睛，个子很小很小。他是那种典型的由于胆小而根本不被人注意的孩子。小时候，他掌握知识很快。三岁时，他特别怕中毒，因为他在一个盛氨水的瓶上看到过‘毒’字。他把水和氨水混为一谈了，因为这两种东西看起来都一样。

“我们提前一年把他送到幼儿园。我们认为，他是独子，应该让他和其他孩子多接触。那些孩子无论年龄还是个头都比他大，他们轮流欺负他，以至于最后我丈夫只得教他保护自己：‘如果有人打你，你就朝他嘴巴上打，看他还敢惹你。’这办法只满足了查尔斯的部分需要，他想知道怎样同时对付一个以上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盯住最大的，把他揍了，其他人都不敢上了。’”

一种略为拘谨的表情从伊丽莎白的脸上掠过。

“你知道，查尔斯一向憎恶暴力，这也是他的死让人觉得有些无法容忍的原因之一。

“他酷爱书，喜欢让别人给他讲故事。生来特别好问，对新事物从不放过。他刚四岁的时候，一天我带他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去，他特别注意那儿展览的恐龙，回家之后还能细致地把它画出来。同年，他开始上学了，每逢父亲节时，我们总是参加学校的庆祝活动。在活动中，教师提问题，谁知道答案，就举手回答，但查尔斯总是静静地呆在那里，一声不吭。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回答问题，‘因为我知道答案了，’他回答说，他一点也不想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的知识，只要自己知道就心满意足了。

“他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在父亲节时给我们看查尔斯的一些作业。老师要求孩子们做个加法题，要求他们先画三只兔子，再加两只，最后等于五只。大部分孩子算得很快，在纸上随便画个兔子了事。‘你们看，’老师说着，把查尔斯的那篇拿给我看。他画了一个兔子。要求做的题他根本没做，可你会看到那是只什么样的兔子：有眼睛，耳朵，尾巴，甚至爪子。是只人们想象中最完整的兔子，尽管它不符

合作作业的要求。那天晚上，我和我丈夫谈起这事，埃德对我说：‘太棒了，我们家出了天才，可他永远不会超过一年级了。’”

一提起这件事，伊丽莎白·霍尔曼微笑了。

查尔斯·霍尔曼的根深深地扎在纽约。他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他的双亲埃德和伊丽莎白·霍尔曼一生都住在纽约。小时候，查尔斯就跟父亲学习所有关于大海，海里的甲壳动物，星星和海潮的知识，也就是说学习任何孩子都感到神奇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查尔斯的记忆里保存了很多年。他喜欢观察夜空中的星群。认识他的人总想分析一下他为什么那么聪明。人们说他的秉性象他父亲，特别是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但是，他又具有伊丽莎白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和他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

尽管如此，更重要的还是查尔斯·霍尔曼生在一个严格保持道德规范的家庭。他的父母为人正直，培养了他是非分明的观念，他们还提高了他评价事物的能力。他青年时代的许多成绩都与他父母的引导和帮助分不开。

在曼哈顿艾伦-史蒂文斯小学，他的学习成绩最好，还是学生会主席。1957年秋，他进入了新罕布什尔罗金汉地区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学校设在埃克塞特河瀑布附近一座旧工厂旁的几座大楼内，以其古老的传统和高等的学术水平而闻名于新英格兰。七百名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学生每天二十四小时呆在那里。

一向不善于适应新环境的查尔斯不知所措地进入了埃克塞特。最初几个月的生活真可怕。在小学一贯称雄的他，在

这里被那些年龄比他大，身体比他壮的新同学看成一个爱卖弄学问的怪人。有人晚上悄悄到他的宿舍把学习用具拿走，不让他学习。他们还用棍子，枕头或随手抄起什么东西打他。十五岁时他的嗓音还没有变，脸上仍然是一副孤僻的神气。冬天快结束的时候，他在打旱冰球时摔断了一条腿。

慢慢地，查尔斯被伙伴们接受了。1960年，他在埃克塞特初中毕业，又上了三年高中，学习成绩优秀。在此之前，他曾是学校里第一个既是文学杂志主编又是历史讨论会主席的学生。但他仍一如既往。他的一个在纽约开了律师事务所的老同学查尔斯·多纳休回忆他同查尔斯在埃克塞特一起学习的日子时说：

“那时候埃克塞特时髦的词是‘反’，意即对生活持否定态度。如果有谁想被人看作是冷静有头脑的人，就得持这种态度。对事情表现出热情就会被认为是不冷静。然而查尔斯·霍尔曼却不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正面理解世界。”

埃克塞特的校长罗伯特·凯斯勒也同样肯定了查尔斯那几年的学生生活：

“他是个出色的、有责任心的、被同学和老师完全信任和尊重的学生。在比他差的同学面前，他不盛气凌人。他遵守纪律，与别人和睦相处又不失自己的个性。他是个真正的领袖人物。”

埃克塞特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上了哈佛大学，其中有查尔斯。也许是因为他正上大学这一点使他同民权运动结了缘，当时许多北部的美国人进入南部，企图改变那个地区的基本结构。查尔斯受到了粗暴待遇。警察镇压的水龙头和警犬对

学生们来说成了家常便饭。他甚至还被以游手好闲罪关进露易斯安娜的普莱克明监狱，尽管他兜里装着二百美元。

随着对周围世界兴趣的增加，他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夏季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和纽约一家建筑公司做了一段工以后，他决定在第三年的夏天搞文学创作。秋天，他回到哈佛，写了这样一段话：

今年夏天我发现我想成为作家。我从未象现在这样坚定又高兴地从事一项计划。

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习。他的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富布赖特奖金，得以在学校继续深造。他在哈佛的老师罗伯特·凯利对我们说：

“我看过的散文和小故事，同他长谈过。他是个模范学生。对学习有真正的兴趣。他不是那种死下功夫或心不在焉、不善于利用时间的一般学生。”

1964年夏天，查尔斯的计划由于越南军事行动升级而突然中止。他入伍后在空军国民警卫队服了六个月的现役，又服了六年预备役。基本训练刚开始时，查尔斯怕自己的身体会带来麻烦，但很快他发现完全可以做到所要求的一切。因此他对自己也有信心了。野营训练结束后，他变得和别人一样了。他所在连的连长想找个搞通讯的人，查尔斯自愿报名，被派去竖电话线杆和架设电话线。第二天他腰系安全带，脚蹬钉鞋，可还没干活一只脚踝就被钉子扎伤了，并因此退役。

现役结束后（他还得到一枚国防纪念奖章）查尔斯·霍尔曼来到西部。他生在纽约，受教育在东部，对世界其它地方的了解只是从《纽约时报》上获得到的。他的生活观点完

全是书生气的。他也为此担心。

“我从未和智商低于130的人打过交道，”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想在世界上会有各式各样的人。”

在KING电视台短期工作后，他被调到设在波特兰的电视台办公室，开始制作纪录片。他在俄勒冈住了两年，制作了一部关于波特兰黑社会和另一部关于在雷德伍德城和加利福尼亚生产凝固汽油弹的影片。后来他又回到东部，开始在WNET电视台、纽约和新泽西教育电视台工作。查尔斯的同事，他的证婚人杰里·科茨回忆他们在电视台工作的日子时说：

“我是电视台的摄影师，查尔斯编辑制作最新新闻。六个月里，我们摄制了一些小短片，有纽约的出租汽车司机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查尔斯要求执行制片人允许我们和赫尔曼·卡恩一起在赫德森学院拍摄一部长片子。我们去了。在三、四天里，我们沉湎于六十年代人们一直在考虑的那些问题：一旦发生核战争，有多少美国人或中国人会死于战争。一天卡恩的一个助手让我们看一张巴西地图，上面用红铅笔圈了亚马逊河的一个流域。卡恩和他的班子已经研究了那个地区被淹没的可能性。查尔斯指着圈线外边的一个城市说：

“这些地区的居民会怎样呢？”

那个助手耸了耸肩膀，回答说：

“不知道。也许鞋都湿了。”

随着越南军事行动升级，查尔斯开始对政府机构越来越不信任了。1967年底，他离开了WNET电视台，加入了反贫困联邦纲领组织。第二年六月，他同乔伊斯·哈姆雷结婚。

他用了一句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话形容乔伊斯：“她是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婚后他们住在曼哈顿西七十五街的一套房子里。查尔斯对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有关报道曾占满了《民族》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整个版面。在哈佛一个同学的帮助下，他到《革新》月刊工作。这是一份专门为企业经理服务的金融杂志。很快他变成了“自由思想分子”。几乎每次编委开会前查尔斯都说：“不知道还能在杂志社干多少时间了。”桌子的另一头，另外几位编委正在公开讨论杂志是否需要支持这些自由派的意见。

与此同时，西街的那套房子也变成了查尔斯的工作室。每天下班后，一回到家，他就坐在那乱堆着东西的写字台前写起来。他并不想马上发表他的作品，只是写着玩。他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吸引住了，想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尽管只是为他自己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们。他随便往什么东西上写，从一张散纸到一个精制的笔记本。在纽约的那几年里，他的日记一直不断，后来到了南美以后又继续写起来。无疑他为这些资料付出了生命。

查尔斯·霍尔曼并不是个圣人。他有缺点，特别是由于年轻和不成熟造成的缺点。他也犯过错误，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有过见解错误一样。但是，他是个热情、坦率、感情丰富的人。他倾听别人的意见，为别人着想，并由衷地为朋友的成就高兴。

和他在一起让人愉快。在谈话中他不时穿插一些轶事和故事。他很有幽默感，但不藐视别人。他开玩笑时从不贬低

别人。他为人很随和，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

另一方面，他的好奇心是很强的。什么都得亲身体验一下才满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人和人的本质持一种乐观态度。他写道：“任何被爱和被尊重的东西都不是坏的。”他从生活中汲取乐趣，又给了生活许多东西。即使在圣地亚哥的太平间找到他枪痕累累的尸体已过了九年，杀害查尔斯的刽子手仍然是不可宽恕的。

二、1970年，智利

一辆黑色轿车在沙漠上静静地行驶着，司机嘴里还轻轻嘟哝着什么。他右侧的一位助手透过车窗望着外边无垠的沙地。在他们后面座位的角落里，睡着智利马克思主义总统竟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他的竞选纲领使他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只好抓紧一切机会打个盹。

阿连德曾三次竞选总统，又三次被击败。1952年，他代表社会党竞选，结果在四位候选人中获得第四位。那年他本来也不指望得到点什么。他参加竞选只不过是为几年之后扩大这个左派组织的影响奠定基石。那为数可怜的选票预示了他们前景。

六年之后，阿连德又出现了。结果是鼓舞人心的。在社会党和共和党的支持下，在五位候选人中居第二位。在120万选民中获得了3.35万张票，从而失去了总统的位置。从¹952年开始，他得到的选票已经增加了五倍。只是由于安东尼奥·萨莫拉诺，一位代表左派激进党的候选人的分裂他才未能进入政府。

1958年失败后不久，阿连德就开始筹划他的未来。总统的宝座已不是远不可及。一次一名记者问他：

“阿连德博士，在不进行总统竞选的时候您干些什么呢？”

阿连德开玩笑地回答：

“我梦想，我也觉得我已是智利总统了。”

那个梦想的实现向后推迟了。在以爱德华多·弗雷为首的稳健派和保守派面前，阿连德遭到了惨重失败。面对联合对立派而灰心丧气的阿连德在知道了选举结果以后对他的一个同伴说：

“我对未来已等得不耐烦了。我已经知道我的墓志铭会这样写：‘未来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安息在此’。”

这是这位以乐观而闻名的人为数不多的失败之一。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1908年7月26日出生于瓦尔帕莱索的一个沿海城市里。父亲是个生活富裕的律师。父亲死后不久他进入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做了十八个月的法医。多年以后，他经常提到这段经历。在无数次尸体解剖中，他已凭直觉意识到吃穿不愁又有医疗条件的一小部分人和状况与此相反的大多数人之间的巨大差别。

1933年，阿连德和一小部分人建立了智利社会党。四年之后，他二十九岁，被选入议会下议院。两年之后，被任命为阿吉雷·塞尔达内阁的卫生部长。在那个职位上，他的仁慈和对人民的关怀被全国人民所了解。

阿连德政治成长经历烙上了恪守宪法的印迹。有时候，他同共产党进行激烈的辩论，努力把世界共产主义同他高擎的社会主义旗帜分开。有些人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成是